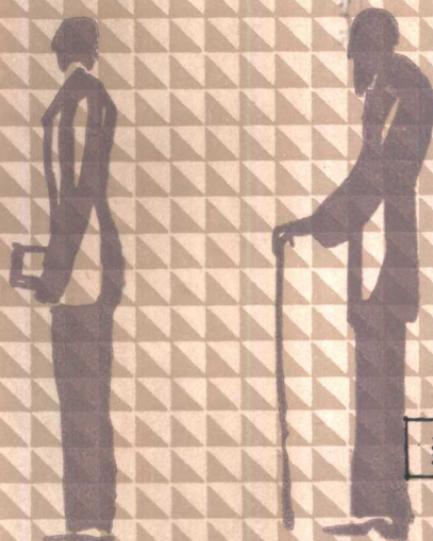


教研室风波

伊·格列科娃

当代外国文学



教研室风波

[苏联] 伊·格列科娃

王俊义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И. ГРЕКОВА

КАФЕ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80

教研室风波
Jiaoyanshi Fengbo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3}{4}$ 插页2

1987年6月北京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700

书号 10208·269

定价 2.15 元

译者前言

伊·格列科娃（本名：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文策尔）是苏联著名数学家，教育学家，教授，技术科学博士，从事过五十二年的高等学校数学教学工作，出版有多种数学专著，其中有的（如她的《概率论》等）已经翻译介绍到我国。

伊·格列科娃的文学创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初，常在《新世界》、《星》和《文学俄罗斯》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灯下》（1966），儿童诗歌集《窗口的谢廖日卡》（1976），中、长篇小说《在出入口处》（1966）、《经受考验》（1967）、《小加鲁索夫》（1970）、《饭店女主人》（1975）、《阿尼娅和玛尼娅》（1978）、《寡妇船》（1981）、《激流险滩》（1984）和《雉》（1985）等。其中有的已被改编成话剧和电视剧，在观众中引起过热烈反响。

《教研室风波》发表于一九七七年，被认为是格列科娃的代表作。小说改编为上下两集电视剧播映后，曾受到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

此前，伊·格列科娃已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当代苏联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寡妇船》和《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翻译介绍到我国后，曾深深打动过许多中国读者的心。

伊·格列科娃虽已是一位高龄作家，而且身兼科学和文学两个不同领域的写作，但近年来她仍不断有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学新作问世。作者的新著小说《激流险滩》和《雉》中表现出的在艺术上的锐意探求精神，正在受到国内评论界的重视。著名老作家卡维林谈到格列科娃的创作时曾说：“您笔下的主人公，一个个都变得象有幸突然失而复得的心爱之物。许许多多尚未充分表现过的、面目模糊不清的熟人一下聚集在了我们的周围，迫使读者去识别和评价他们，有女工长、有受到命运公正或不公正惩罚的寡妇、勇敢地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的军官、工人，也有象中篇小说《教研室风波》里描写的这些真伪科学家们。您迫使读者思考他们，从而也思考自己。这一特点对于俄罗斯文学，大概可以说，永远是有代表性的……”（《十月》，1984年第9期，《写字台》。）

伊·格列科娃在文学创作上以反映当代苏联科技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为主要题材。《教研室风波》便是集中体现着这一特点的作品之一。小说以苏联某高等学校控制论教研室为背景，以教研室围绕主任接班人问题、教学和教人问题、科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上的一场风波为线索，对科技知识界的许多道德冲突问题作了广泛的、富有哲理性的展示。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

作者笔下的原教研室主任扎瓦利申（HH）教授显然是一位老辈科技知识分子的典型，作者通过对他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满怀深情地展现了这位老科学家善良、美好的心

灵。HH去世后，临时代行教研室领导职务的弗利亚金教授也是个品德高尚的人，甚至还有着老HH教授所不能比拟的许多长处和才能，如思想敏锐，原则性强，纪律严明，一丝不苟；敢于面对现实，对一切矛盾都决不妥协，而且能处处身体力行等。但是，尽管他有着一个新型管理干部的许多优点，但与HH教授相比，他却缺乏一种最基本的品格——关心人。“领导一个集体，最低限度自己得是个人”，“同时还要知人。一个对学生没有感情的人，不适合当教研室主任。”他在代任教研室领导期间，因刚愎自用、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几乎遭到了全室教师的反对。在主任竞选中，他面对大家的批评，正视了自己的弱点，主动退出了室主任的候选竞赛，只是这时，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才变得更高大了。

作者笔下的副教授尼娜·阿斯塔绍娃和助教帕沙·鲁巴金则是科技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代表。他们有业务能力、肯于钻研、思想活跃，正直善良，疾恶如仇。而这一切优秀品格都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待扎瓦利申(HH)、弗利亚金和被称为“贼猫”的雅科夫金这三位教授的爱憎分明的态度上。

小说中“作贼的猫”——雅科夫金这个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不学无术，投机取巧，靠拉关系混上了教授头衔，爬到了教研室主任的宝座。在学院领导提出教研室主任全盘博士化的口号下，他又妄图靠侵吞自己下属的学术成果来捞取博士桂冠。他的卑劣行径，遭到了尼娜·阿斯塔绍娃的无情揭露。作者通过雅科夫金这个人

物形象，以犀利的笔触，把现实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文贼”的虚伪面目刻画得入木三分，读来颇耐寻味。

作者在主要描写人物的工作和斗争的同时，还以大量的篇幅展示了他们工作、事业之外的日常生活，写了他们各自的人生命途，爱情上的悲欢离合，家庭生活中的“难唱曲”，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从而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了人物的不同境遇、情操和精神世界，从而也就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使整个作品更富生活情趣。所有这些，都是读者所不难体味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次

译者前言	1
教研室会议	1
尼娜·阿斯塔绍娃及其亲友	24
柳达·韦利奇科	42
HH 教授(个人生活)	55
达里娅·斯捷潘诺夫娜与电视机	69
HH 与迈卡·杜多罗娃	84
利季娅·米哈伊洛夫娜	116
阿霞·乌曼斯卡娅	139
春季考试期	159
H. H. 扎瓦利申的科学遗产	170
摘自 H. H. 扎瓦利申的私人笔记	186
在思考	217
摘自 H. H. 扎瓦利申的私人笔记	244
马特维·韦利奇科	256
柳达·韦利奇科的来信	276
维克托·安德烈耶维奇·弗利亚金	280

摘自H. H. 扎瓦利申的私人笔记	294
作贼的猫	296
摘自H. H. 扎瓦利申的私人笔记	317
马特维的命运	321
各种各样的事	338
谢廖沙·科赫的来信	353
柳达·韦利奇科的来信	355
候选竞赛	357

教研室会议

短促的冬日，被阳光染成金黄色，就要结束了。系着白昼的蛛网，眼看就要断了。窗外的校园里，冻硬了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树枝上残留着的两三片树叶随风摇曳。

在 387 号房间（主楼三层）里，正在开教研室会议。靠近窗户的一角，是一张又重又大的桌子，桌后坐着教研室主任扎瓦利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教授，简称之为 HH^①，大家背地里都这样称呼他，有人甚至当面也这样叫他。他并不介意：HH——很好的名字嘛。在上个世纪，某些未知的、假设的东西就是这样表示的。“在省会 NN 市的一家旅馆门口……”^② 这个省会也是未知的、假设的。

从外表看，这是个矮个子小老头，黄色的秃顶呈圆锥体，秃顶底下和后边长着一圈象簪帚似的白发。差不多有一指厚的眼镜片遮住了他的眼睛，使眼睛的表情变得高深莫测。灰白色的耳朵、活动的假牙、扎煞的花白胡子——这

① HH 读恩恩，是扎瓦利申名字和父名的缩写，跟拉丁文的 NN (nomen nescio 的缩写) 读音相同，NN 意为某人，某某。

② 果戈理 (1809—1852) 的小说《死魂灵》开头一句话。

一切使他的外貌显得古怪，如果不是可怕的话。不过，这样的外貌是可以习惯的。教研室里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些人甚至还认为 HH 的外貌自有其可爱之处，如同木偶戏里公然不讳的滑稽角色一样可爱。他待人和善，不吹毛求疵——还能要求主任怎么样呢？至于说有时他喜欢谈谈，你又有什么法子。每个人都有缺点。重要的是“别添毛病”。

HH 的副手克拉夫佐夫副教授为了保持明显的独立性，坐得稍远些，他是个圆脸的黑发男子，体型象黄瓜，长着纤细的小胡子。这个人城府颇深。别看他很年轻（三十五岁），可他已经大致准备好了这篇时髦的、现代题材的博士论文《自动调整系统理论中的系统工程方法》。他一心指望在 HH 死后（或者退休后，因为他并不怀恨于他）能接替他的职务，把教研室整顿一番。未来向他展现出一幅更加诱人的远景：通讯院士，也许是院士。不必急于求成，他还年轻。

教研室很狭窄，呈长方形，是革命前的楼房中一间十分讲究的客厅的一半。带锈迹的天花板很高，足有五米；天花板下面是雕花奇妙的墙檐。这座古老建筑已处于半倒塌状态。早就答应给学院在市郊什么地方建一座新校舍，那里从市中心乘车得走一个多小时。新楼尚未破土动工，可旧楼已停止修缮了。

教研室的老师——副教授和助教们——以各种各样的姿势分散地坐在房间里。除了 HH 外，再也没有教授了，为

此，院长办公室经常责备他（“您很少做培养干部的工作”）。看来，克拉夫佐夫将是第一个被培养的人。

在装进口设备用的高高的铁箱子上，也就是所谓的电椅上，坐着谢苗·彼得罗维奇·斯皮瓦克，一个穿绒布裤子的大胡子勇士，在教研室里，大家都叫他“嗓音洪亮的胖子”。他并不胖，只不过是块头大，占的地方大而已。他把两条腿叉开，脚上的皮鞋（四十六号）带系错了。嘴周围的黑胡子镶上了一圈银白色，就象皮领子挂霜似的。在白色中间，清晰地露出一张双唇湿润的大嘴。谢苗·彼得罗维奇大体上算是漂亮的，虽说身材过于膨胀，模样儿又过分含有敌意。尽管他年岁不小了（五十岁上下），又有好打二分的名声，可是女学生们还是为他而神魂颠倒。有一次教研室开会，他坐的沙发椅轰隆一声倒塌了，从那时起，他就总是坐铁箱子。谢苗·彼得罗维奇，一般地说，是个性情暴躁的人，就是那次，正当他和别人争论得很激烈，并例举无法反驳的理由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响——椅子完蛋了。不要这样动感情嘛！办事员利季娅·米哈伊洛夫娜责备他说，她是教研室里唯一跟家具有关系的人。每次谈到椅子坏了，她照例都要提到亚历山大大帝^①，其他人，当然，也要顺便开上几句平淡无味的玩笑。

新家具——细腿的矮桌子，不结实的椅子和样子不知是象筐还是象鱼篓的沙发椅——是去年根据学院更新设备

^① 马其顿国王（前336—前323）；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第一幕第一场里市长讲到一个历史教师在讲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曾把椅子摔了。

的计划发到教研室的。大家都顺从地接受了，只有HH一个人断然拒绝跟他那张三十年代造的剑齿象似的桌子分手。事实证明，他没有失算：新家具太不结实了，都叫人伤心。半年过后，正如教师们所说，新家具“经历了半分裂时期”——桌子门关不上，抽屉则恰恰相反，很难开。有一半椅子只剩下腿儿，连学院的木工都不肯修了，他说：“这只能当烧柴！”而HH的桌子连同上边的卡斯科城铸造的文具（勇士头像式的墨水瓶）已经摆了几十年，而且还可以摆下去。

离门不远的地方，坐着列夫·米哈伊洛维奇·马尔金，他头发花白，乱蓬蓬的，在那清癯的面庞上总是流露出常见的讥讽神情。他把讥讽当成自己的一种职业。

在一张桌子旁边，并排坐着两个女友——埃拉·杰尼索娃和施特拉·波利亚科娃。埃拉是个光彩夺目的黄发女郎，有着水果糖一样淡红色皮肤，理应被认为是教研室第一美人（马尔金称呼她为“控制论小姐”）。其实，这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教研室的女人是屈指可数的一两个。施特拉比她大，模样也不漂亮，长着一张羊脸，然而，却是所谓的会讲时髦的人，不但衣服时髦，主要是鞋更时髦。现在，她穿着一双高平底的便鞋。她不时地打量着她那从桌子底下向侧面伸出的一条蛇形的腿。

助教帕沙·鲁巴金就坐在她们身后，他目光浑浊、头发很长，穿着一件“仿嬉皮士”的破牛仔裤，耳朵后还夹着一只烟卷。他的嗓音就象是从地下室传出来的，谈起话来漫无边际，不过还是颇有兴味的。

仿佛是为了形成鲜明对照似的，在他身旁的是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捷尔诺夫斯基。他是教研室最老的工作人员之一，年纪已不轻，一头浓厚的白发，是属于从前称做学究的那种人：他梳的不是偏分头，而是平分头，戴着一副带链的契诃夫式的夹鼻眼镜，穿着一套无可挑剔的黑西服，每次上课后他都要用小刷子刷一遍。除捷尔诺夫斯基外，所有的教师平时浑身上下都是粉笔面子。“我们大家都是用同样的白粉子刷的，”斯皮瓦克说。他倒真有办法，不仅前身和袖子，而且后背都弄上了粉笔面子。

在捷尔诺夫斯基身后，坐着拉季·尤里耶夫，他把两手交叉地放在椅子背上，拄着下颏，他头很窄，一头深棕色的浓发向后披着，他虽说已不年轻，可他一微笑起来还象青年人一样，露出一口好看的、长长的黄牙，依然充满着魅力。拉季的微笑完全是不可战胜的（教研室说他的笑是“穿透性辐射”）。在教研室的争论和冲突中，拉季常常起缓冲作用。

似乎只有上述这些人在听报告，而其他人简直是在受罪。有的人藏藏掖掖地用一只眼睛看小说。

作报告的是尼娜·伊格纳季耶夫娜·阿斯塔绍娃——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身子细得象箭；不很漂亮，也不很年轻（接近四十岁了），但她那又匀称又好看的身材和非常敏捷的动作有其独到的诱人之处。她身上的某些特征，只有岩羚羊或者狍子等某种野兽身上才有。

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二分问题。冬季最紧张的考试时期总算过去，只剩下补考了。“全部黑麦还没有运走，但已收

割完毕。他们轻松些了。”马尔金用涅克拉索夫^①的这句话，来描写这时的情景。他一开口就引经据典，可以随时加进谈话中去，有时甚至用得很贴切。记忆力好极了。克拉夫佐夫说他的记忆力“没用到正地方”。

按照教研室会议计划，现在正在讨论期考的结果。阿斯塔绍娃讲话声音很高，用的是在大教室里讲课时那样大的音量，吐字清楚，字尾咬得很准——现在就录音都行。有经验的教师常常是这样讲话——大声地、流利地、权威地，给人一种傲慢的印象，一般说来，这也只是一种假相。这不过是职业训练的结果。

环境就是这样。正在作报告。

“二分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每个考期，我们都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是徒劳无益。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办法。‘不能把一匹马和一只胆小的鹿套在一挂车上’。系领导需要的是什么呢？官僚主义的相安无事。是四分和五分的比例稳步上升，一个考期比一个考期好，而二分的比例有所下降。一个在增长，一个在下降！我们一年要干两次侮辱性的事——听取关于提高学习成绩的斗争情况的报告。我们要计算百分比以及各百分比的大小，绘制图表……我们本来够忙了，又让这些琐事占去很多时间，难道不害臊吗？”

“说得对！”斯皮瓦克用他那洪亮的男低音赞同道。

① 涅克拉索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1821—1877)，俄国诗人，

“会让您发言的，”克拉夫佐夫说。（HH一声不响，眼镜后面的表情是难以捉摸的。）“尼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请您继续讲。”

“我继续讲。系领导幻想的是，所有学生都得五分。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优秀’这个字眼儿本身就意味着‘出类拔萃’。如果没有三分和四分，也就无所谓五分。这可不是保存在度量衡馆里的标准米尺。主考人在给学生打分时，不是按照绝对的刻度，而是按照相对的刻度来衡量他的知识。”

“哎，不是那么回事！”斯皮瓦克厌烦地说。“问题不在于五分，而在于二分。”

克拉夫佐夫用铅笔敲了几下桌子，说：

“请报告人继续讲，其他人不要发表意见。”

“我继续讲。一方面是系领导，另一方面是我们。他们需要的是形式上的相安无事，我们需要的可不是形式上的知识。当然，最简单不过的是去迎合他们：二分一个不打，三分少打，四分和五分——根据要求。这样，日子也就好过了，谁都不会责备我们，除非是我们的良心……”

“‘良心是有利爪的、挠心的野兽’，”马尔金讨好地帮腔说。

“是的，良心，”阿斯塔绍娃脸色一沉，又强调一句。“正如生活教导我们的那样，这是很不坚固、很不牢靠的支柱。一个人的行为不是受良心指使的，而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种情况总把我们推向虚假的世界。

虚假的分数、虚假的成绩、虚假的报表……”

“您的打击面是否太大了，尼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克拉夫佐夫谨慎地问道。

“一点也不，打击面纯粹是局部的：我说的是咱们学校的事情。怎么样估价我们的工作呢？是按照平均分数，按照二分所占的比例。这是毫无道理的！不是我们自己还会有人来给我们打分呢？让我们同生产的其它领域来比较一下吧。哪儿听说过，一个工厂、一个车间的工作好坏是用他们自己打的分数来评价的？可在我们这里情况就是如此！形式上的标准如果没有客观的监督方法来辅助，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浮夸。”

一听到“浮夸”，克拉夫佐夫就立刻警觉起来，并说了一句：

“我反对。这是诬告。”

“不是诬告。让我们都作老实人吧。让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不是来自上边的压力，他会打多少个二分？”

“我吗？现在打多少还打多少，”斯皮瓦克说。

“我相信。但您是个例外。常规是人所共知的：心里想的是二分，打的却是三分。”

“我不同意，”克拉夫佐夫说。“我打分数时没有感到任何压力。”

“您也是例外，”阿斯塔绍娃露出了一颗兔牙，不客气地说。

“尼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说得对，”捷尔诺夫斯基说。